

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

蘇聖雄

摘 要

學界探討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時，常指出蔣有意藉擴大上海戰事，誘使日軍由北往南之進攻軸線，轉變為由東向西仰攻之不利態勢。會戰後，國軍雖傷亡慘重，但迫使日軍作戰重心南移，可說獲得了戰略上的成功。此一「軸線移轉說」遭到許多質疑，正反意見紛陳，至今仍未有定見。

本文以此為中心，參酌當事人日記及相關檔案，重探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結論指出，蔣有意主動在淞滬發動攻勢，其戰略為先發制敵，保衛京滬要地，及支持政略。在初期戰事不利之後，蔣轉為持久戰略，欲在淞滬持久消耗日軍，以待國際援助或日本內部變化。至9月下旬，從持久戰略衍伸出引敵南下戰略，意圖將主戰場由華北轉移至淞滬，使日軍被動，國軍擊其一點，配合政略進展。戰事末期，蔣受政略牽引，在空間持久與陣地持久間拿捏未當，最終喪失有序撤退良機，全軍潰退。

蔣中正的淞滬戰略，有一演進過程；至於軸線移轉戰略，戰前雖曾討論，開戰後實未執行。

關鍵字：蔣中正、淞滬會戰、中日戰爭、持久戰、引敵南下

Re-visiting Chiang Kai-shek's Strategy for the Battle of Shanghai

Sheng-hsiung Su*

Abstract

It has often been pointed out by scholars that Chiang Kai-shek's strategy for the Battle of Shanghai was intended to broaden the battle scope for the purpose of enticing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the IJA) to change their offense axis from north-south to east-west China. Although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the NRA) had suffered heavy casualties in this battle, they managed to drive the IJA's main force to the south successfully. So this "axis-changing strategy" argument emphasizes that the NRA was successful in terms of strategy. In effect, until now, there has been no consensus on the matter.

This article re-visits this particular issue, and concludes that Chiang did intend to launch a war in Shanghai actively, and his strategies were multiple, including preemptive strikes, strategic points defending, and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at the beginning. After having failed to initiate combat, his strategy turned to a protracted war. In late September, the protracted war strategy was so extended as to entice the IJA's main force from North to South China. Near the end of the war, Chiang was so swayed by diplomacy that he could not have chosen his retreat timing well. The NRA however lost this battle tragically in consequence. In sum, Chiang Kai-shek's strategy for the Battle of Shanghai was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Axis-changing strategy" was being discussed in the prewar period, but was actually not put into practice in the Battle of Shanghai.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Battle of Shanghai, Sino-Japanese War, protracted war, luring the enemy southward

*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

蘇聖雄**

壹、前言

1937年8月13日爆發的淞滬會戰，是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首場的大規模會戰。此一會戰為戰爭擴大化之關鍵，雙方在此一戰役皆傷亡慘重。時任中國最高統帥的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為何？學界對此討論甚多，卻仍未有定論。

較早討論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者為臺灣學者，多數持肯定看法。早先流行的觀點，為淞滬會戰吸引華北日軍，牽制全局日軍行動，配合華北國軍作戰，且使得在長江流域作戰優於華北之國軍，得以充分發揮所長。至1970年代中期以後，另一說異軍突起，掌握了詮釋權，即淞滬會戰導致國軍作戰正面的轉換，使日軍由向南作戰，改為向西仰攻。此說最早出現於1966年10月由國防部史政局出版之《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一書，該書強調蔣中正在1937年8月，考慮國軍若於平漢線決戰失敗，日軍可長驅南下，直搗武漢腹地，剖中國為東西兩部，留中國重要物資於沿海，分割中國戰列部隊，中國抗戰便將因此支離破碎，喪失持久消耗之憑藉。蔣洞察此一危機，調動主力50多個師集中於華東，利用複雜的湖沼地形，在國際觀瞻所繫之政略要地淞滬主動發動攻勢，迫使日軍「由

* 本文初稿曾於2014年9月1日「重慶與抗戰時期的中國」海峽兩岸學術與文化論壇（重慶）宣讀，承蒙張瑞德、王奇生、陳廷湘等教授惠予寶貴意見。兩位匿名審查人及李君山教授的具體修改建議，作者獲益甚大，於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14年7月7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10月15日。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北而南」有利之作戰軸線，改變為「由東向西」的不利仰攻態勢，於是國軍主導了戰場先機，掩護物資西遷和千萬同胞之撤運。¹此一戰略，本文概括稱作「軸線移轉說」。蔣緯國在其總編的《抗日禦侮》（10卷）中，對該說做了更為充分的闡釋，²他尚在其他著作宣揚蔣中正此一戰略對中日戰爭的重要性，舉要如《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中日戰爭之戰略評析〉、《蔣委員長中正先生抗日全程戰爭指導》等。³此後臺灣學界論述國軍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大抵延續此說；原未強調此說之學者，亦開始重視此說。⁴

1992年中國學者余子道發表〈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問題〉一文，首次對軸線移轉說提出質疑。該文指出，蔣中正及國軍各高級將領關於抗日戰爭的論著中，「從未披露過這一事關全域的重大決策形成的史實材料」，大本營制定的作戰方針和計畫，也完全沒有提出這項目標，因此這種說法缺乏根據，不足為信。且淞滬會戰並未就此改變日軍的作戰方向。⁵約略同時，臺灣學者李君山著《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一書，指出日軍當初沒有直下武漢的企圖，故淞滬會戰沒有迫誘敵人走向錯誤方向之效果，反倒提早了武漢之役。⁶余子道、李君山的說法，

¹ 胡璞玉編纂，《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6年），頁126-127。

² 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共10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年）。

³ 蔣緯國，〈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7卷第9期（1975年7月），頁119-133；蔣緯國，〈抗戰史話：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8卷第6期（1976年4月），頁124-133；蔣緯國，〈抗戰史話：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8卷第11期（1976年9月），頁92-102；蔣緯國，《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年）；蔣緯國，〈中日戰爭之戰略評析〉，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4冊（臺北：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1年），頁1-29；蔣緯國，《蔣委員長中正先生抗日全程戰爭指導》（臺北：中華戰略學會，1995年）。

⁴ 如吳相湘在《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頁391-392；該書談到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未提及軸線移轉說，其後所作之〈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則專節討論中國「誘使日軍作戰正面由南下轉變成西上」。該文收入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之國民政府（1937年至1945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2版），頁50-101。

⁵ 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2年第3期（1992年8月），頁1-21。

⁶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似未被臺灣學界所重視，鮮見學者為文討論。反倒是中國學者馬振犢於1994年撰〈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一文，反駁余子道的說法，列舉史料，間接證明國民政府發動淞滬戰役具有引敵南下，及迫使日軍由北向南轉為自東向西的戰略意圖。⁷自此，中國學界對淞滬戰略開啟熱烈的討論，⁸歐美、日本學界在論述這一段史事亦各有說法。及至今日，該討論仍舊未有定論。

軸線移轉說所以引人熱烈討論，歷久不衰，一大原因在直接史料缺乏，無法藉關鍵史料一錘定音。尤其蔣中正個人的想法，在其日記公開以前，雖可藉由日記的衍生資料探究所思，⁹然這些衍生資料之史料價值，仍未若日記每日記載之完備。2008年劉貴福、朱晉平利用新近公開之《蔣介石日記》，重探軸線移轉說，結論指出日記無法證明和支持蔣中正一開始就有改變日軍作戰軸心之戰略意圖，中方的淞滬戰略實有多重目的。¹⁰該研究甚具價值，呈現蔣在日記中的戰略思考，並指明使日軍作戰方向轉移之戰略有商榷餘地。然而，該文引用史料較為單一，相關討論仍有開展空間。2011年姜良芹亦利用《蔣介石日記》等史料，指出蔣中正自淞滬會戰至南京保衛戰期間，政略、戰略選擇嚴重失誤，惟該文力圖

1992年)。李君山、余子道之著作，未徵引對方說法，推論二者應是獨立發展其反駁軸線移轉說之論點，非受對方啟發。

⁷ 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2期（1994年5月），頁213-220。

⁸ 如孟彭興，〈蔣介石上海抗戰決策研究〉，《軍事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1994年2月），頁41、55-63；余子道，〈淞滬戰役的戰略企圖和作戰方針論析——兼答馬振犢先生〉，《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1995年5月），頁26-44；黃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1995年5月），頁45-60；余子道，〈論中國正面戰場初期的戰略作戰方向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1999年2月），頁79-91；馬振犢，〈平心靜論「八一三」〉，《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頁101-114。

⁹ 劉維開，〈《蔣中正日記》及其衍生資料〉，收入陳進金主編，《國內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年），頁173-229。

¹⁰ 劉貴福、朱晉平，〈從《蔣介石日記》看淞滬抗戰的一個問題〉，《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頁43-49。楊天石亦曾大量引用《蔣介石日記》，探討蔣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頁223-251。該文未特別聚焦於軸線移轉說，僅於文末「附記」以兩段文字做討論，結論提到「當時蔣介石開闢淞滬戰場的目的，在於分散日軍兵力，粉碎首先佔領華北的侵略計劃」。

跳脫「軍事的邏輯」及「以戰爭論戰爭」，故對軍事戰略課題發揮有限。¹¹

本文主要利用蔣中正、陳誠等重要將領之日記，及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陳誠副總統文物》等史料，重新探討軸線移轉說。首先討論戰前蔣中正的對日戰略演進，復探討中日淞滬開戰過程，蔣中正是否為轉移戰爭軸線而發動主動攻擊？是時之戰略為何？淞滬會戰有無引敵南下之意圖？戰略得失為何？

中文通用的「戰略」今義，發源於西方。自 1777 年梅齊樂 (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 著《戰爭理論》一書後，「戰略」(strategy) 一詞逐漸變成軍事術語。19 世紀初，克勞塞維茨 (Karl von Clausewitz) 著《戰爭論》、約米尼 (Antoine Henri Jomini) 著《戰爭藝術》之後，「戰略」開始發展成一門學問。中國古代雖有作為書名的「戰略」，卻未用作軍事術語。最初將西方 “strategy” 譯為「戰略」者，可能是日本人，此一名詞於清末引進中國，成為清末軍事學府的教學內容。¹²

20 世紀英國重要的戰略學家李德哈特 (B. H. Liddell Hart) 整合前人說法，定義「戰略」為：「分配和使用軍事工具以達到政策目標的藝術。」此一戰略定義限制在戰爭層面，故又稱為「軍事戰略」。¹³ 另有所謂「大戰略」(grand strategy)，為較軍事戰略高級的戰略，其任務為協調和指導所有一切國家資源 (或若干國家資源)，以達到戰爭的政治目的，而這個目的，則由基本政策來決定；軍事僅為大戰略工具中之一種，大戰略必須考慮和使用財政壓力、外交壓力、商業壓力，以及道義壓力，以削弱對方的意志。¹⁴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發展出「國家戰略」一詞，法國博弗爾 (André Beaufre) 則創造「總體戰略」一

¹¹ 姜良芹，〈從淞滬到南京：蔣介石政戰略選擇之失誤及其轉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1 年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103-115。

¹² 鈕先鍾，《戰略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7。

¹³ 軍事術語中，有「野戰戰略」，譯自 “operational strategy”，實與軍事戰略並無二致，且定義更為狹隘，故本文未強調此一術語。參見鈕先鍾，《戰略研究》，頁 7-13、31。軍語中，「戰略」尚有更細緻的區分，如經濟戰略、心理戰略、戰區戰略等，參見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第 10 卷，頁 319-321。

¹⁴ B. H. Liddell-Hart, *Strategy* (New York, N.Y., U.S.A.: Meridian, 1991, c1967), pp. 353-360；鈕先鍾，《戰略研究》，頁 13-22。

詞，二者之內涵與大戰略皆無太大差異。¹⁵

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後，中國軍政要員對戰略一詞的使用，接近上述之「軍事戰略」；「政略」一詞，則類同大戰略。¹⁶ 本文主題為戰爭軸線之轉移，重點在軍事作為，可說是一種軍事戰略。

貳、戰前蔣中正的對日戰略

蔣中正對日抗戰之戰略，是為持久戰略。至晚在 1932 年上海一二八戰役之時，蔣便有此一想法。該戰事爆發後，2 月 24 日，蔣臥病在床，並與汪兆銘、何應欽、陳銘樞等要員會談，「仍欲以原定方針決戰勝利後，亦即退後以交涉途徑進行，以先示弱與和平之意，而準備仍以抵抗到底也」。此意見為陳銘樞、李濟深所反對，蔣認為「若輩誠亡國而恤，只圖一己之權利與虛榮，可歎！」故仍「決心與日持久抵抗，使日寇不能休戰也」。¹⁷ 25 日，蔣命何應欽從速準備第二期抗戰計畫，聲稱決心「與倭持久作戰，非如此不足以殺其自大之野心」。27 日，蔣決定軍事計畫大旨，內容提到「充實一切自衛力量，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¹⁸ 5 月 20 日，又記道：「對外日本內訌漸烈，以後對我侵略雖烈，但其決難持久。」¹⁹

1933 年初長城戰役期間，蔣於 1 月 23 日自記：「倭寇目的，敵實在美俄。如其果與我國大規模正式開戰，則其無的放矢，雖勝必敗，此亦其最大之弱點，

¹⁵ 鈕先鍾，《戰略研究》，頁 22-31。

¹⁶ 1950 年代，蔣中正手示：「戰爭藝術書約米尼著設法購來譯呈。」隨後，鈕先鍾奉示翻譯出版，蔣批示：「已閱，譯稿甚佳。」參見約米尼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臺北：軍事譯粹社，1955 年 3 版）。鈕先鍾將約米尼書第一章的章名譯為「政略」，而數十年後的版本則修訂為「大戰略」。約米尼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戰略、大戰術、以及政治軍事的綜合原則》（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由此，似可見「政略」、「大戰略」二詞翻譯上的演進與互通。

¹⁷ 《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以下省略），1932 年 2 月 24 日。

¹⁸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 2 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 年），頁 182-183。

¹⁹ 《蔣介石日記》，1932 年 5 月 20 日。

故決與之持久戰鬥也。」3月17日，記云：「如本黨能照余意，以緩和持久時間，而與倭以經濟戰爭，則其國民難堪，不出三年，必可使倭屈服。」²⁰4月11日，蔣於南昌召開軍事整理會議，連日指示安內攘外政策。12日的演講中說道：

我們現在抗日，決不是短期幾個月可以完結的，一定要作長期抵抗的準備和決心，我們國家才有希望。……我們如果採取一線配備與之一次決戰的抗戰計畫，就是所謂孤注一擲，一敗之後，將永無復興之望了。因此我們現在對於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以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地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預料國際上總有新的發展，敵人自己國內也一定有新的變化，這樣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線希望。²¹

此時的對日持久戰略，已更為完備，在中日軍事實力存有巨大差距的情形下，蔣計劃拖長時間——此時估計3、5年，以待國際及日本自身之變化。而既然中國單獨作戰、等待國際變化的時間為3、5年，則蔣預估的全程戰爭時間應當更為長久。²²4月25日，蔣復記曰：「與寇決最後之勝負，惟在時間之持久耳。」²³

除了考慮戰爭的持久，蔣亦考慮到戰時防禦重點區域的問題。1934年4月底，蔣在廬山與德國軍事顧問塞克特(Hans von Seeckt)談話時提到，對日國防重點區域應在長江流域，而不在華北。因此，決定只用16%的軍事預算於華北，選擇戰略要點，構築國防工事。蔣又表示，從政治上來看，長江以南遠比以北地區重要。²⁴蔣此時告知塞克特抗戰核心在長江流域，與日後重視四川等西部各省看似有所不同，實則蔣在1933年中以後，已將注意力置於四川，該年8月

²⁰ 《蔣介石日記》，1933年1月23日、3月17日。

²¹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頁292-295。底線為筆者所加，下同。

²² 楊天石，〈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頁130-131。

²³ 《蔣介石日記》，1933年4月25日。

²⁴ 〈塞克特與蔣介石會談記錄〉(1934年5月4日)，轉引自馬振犢，〈平心靜論「八一三」〉，《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頁110。

17日日記云：「大戰未起以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甚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9月11日，記曰：「我之有形軍備，是否積極進行為宜？抑除整理內政，寄軍令於內政之外，不在江海作軍備，積極整頓陝川，以作最後復興之基乎？」²⁵

1934年，蔣中正對西南，特別是四川作為抗日根據地，考慮增多。²⁶該年11月22日日記曰：「川事以外患與時間而論，應著手負責。」23日日記道：「如經營四川，應注重駐地，以對倭寇與俄寇與兩廣皆有能顧到為要也。」12月29日日記云：「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可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為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²⁷

1935年，隨著國民政府中央軍為追擊共軍進入四川，中央漸漸對四川有實質掌控，也因此獲得對日戰爭時的一大根據地。3月4日，蔣在重慶的黨務辦事處擴大紀念週演講，明確提出「四川應作復興民族之根據地」，指明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文化普及，一切條件完備，應作中華民族立國之根據地。²⁸7月9日蔣在日記中寫到：「對倭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以洛陽、襄樊、荊宜、常德為最後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8月1日日記云：「肅清基地方能對倭。」²⁹8月20日，德籍軍事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呈送關於應付時局對策之建議，提及：「對海正面有重大意義者，首推長江。敵苟能控制中國最重要之中心點至武漢一帶，則中國之防力已失一最重要之根據，即範圍廣大是也，於是直至內地，中國截分為二。」「四川為最後防地，富庶而因地理關係特形安全之省份，宜設法籌備使作最後預備隊，自有重

²⁵ 《蔣介石日記》，1933年8月17日、9月11日。

²⁶ 楊天石，〈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頁131。

²⁷ 《蔣介石日記》，1934年11月22、23日；12月29日。

²⁸ 〈四川應作復興民族之根據地〉（1935年3月4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3，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113-119。

²⁹ 《蔣介石日記》，1935年7月9日、8月1日。

大意義。」³⁰ 9月30日，蔣在日記中的冬季日課表記到：「此時仍思預定計劃進行，以長江為革命之中心，為對內對外之根據，時時不忘主動地位。」³¹ 足見蔣是時構想的對日戰略已演進為以長江為中心的構築防線，並以川、黔、陝等西部省分為後方，尤其視四川為最後根據地。10月，中央派至華北宣述參謀本部對日計畫之熊斌，對時為山西省政府主席之徐永昌說道：

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勤共後，與敵可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只要上下團結，決可求得獨立生存，雖戰敗到極點，亦不屈服。³²

明確呈現蔣對日戰略的演進與形勢的變遷密切相關。迫使日軍進攻由北往南轉變為由東往西之戰略，亦隱約成形。

淞滬會戰末期，蔣在南京國防最高會議上，清楚追憶持久戰略的形成經過：

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時。到川以後，我纔覺得我們抗日之戰一定有辦法。因為對外作戰，首先要有後方根據地。如果沒有像四川那樣地大物博人力眾庶的區域作基礎。那我們對抗暴日，祇能如一二八時候將中樞退至洛陽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為止，那時候是絕無抗戰的把握，一切誹謗，只好暫時忍受……。到了二十四年進入四川，這纔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戰的後方。所以從那時起，就致力於實行抗戰的準備。³³

如前文所述，蔣中正最晚於一二八事變時便已思考持久戰略，但當時尚缺乏足以撐持持久戰的後方根據地。及至1935年中央軍入川剿共，方獲得此一人力、物

³⁰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中國抗日戰備之兩份建議書〉，《民國檔案》，1991年第2期（1991年5月），頁24-27。

³¹ 《蔣介石日記》，1935年9月30日。

³²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318。

³³ 蔣中正，〈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1937年11月1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653。

資充裕的大後方，因此而對日持久戰略大定，蔣更加致力於持久戰的戰爭準備。蔣此一追憶，與熊斌所言相呼應，可證兩段史料皆所言不虛。本文將這種重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稱作「空間持久戰略」，以與後文所述死守陣地爭取時間的「陣地持久戰略」做區別。「空間持久」與「陣地持久」皆為持久戰的一環，只是著重點不同。前者重視有生力量之保存，在廣大的空間與敵軍周旋；後者重視陣地、城池之爭奪，在既有戰線上與日軍持久。³⁴

1935年持久戰略確定之後，蔣中正對如何持久，有諸多設想。1936年7月，蔣接見即將離任的英籍財經顧問李滋羅斯(Sir Leith Ross)，談到由於中國力量不足以對日，戰爭來臨時，將在臨海地區作強烈抵抗，再逐步向內陸撤退，等待英、美參戰。³⁵同年10月，蔣中正召陳誠至廬山，陳其後隨蔣進駐洛陽，策劃抗日計畫。據陳回憶，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均於此時策定：

即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關於戰鬥序列，應依戰事發展不斷調整部署，以期適合機宜；關於最後國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亦均於此時作大體之決定。總之，我們作戰的最高原則，是要以犧牲爭取空間，以空間爭取時間，以時間爭取最後勝利。³⁶

此一史料，相當關鍵，顯示在上海開戰移轉日軍進攻軸線的戰略，最晚在1936年10月已然形成。

1936年底，參謀本部擬訂「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畫」，1937年1月完成甲、乙兩案稿本，3月修訂完畢，經參謀總長程潛等審定後，由陳誠轉蔣中正審

³⁴ 戰時蔣中正有時將持久戰以「戰術」做論述。依照克勞塞維茨的定義，戰術是「在交戰中對武裝部隊的運用」。杜派(T. N. Dupuy)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認識戰爭：戰鬥的歷史與理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頁79。對蔣來說，持久戰有戰略層次上的涵義，而實踐於基層部隊時，亦有戰術層次上之意義。

³⁵ 轉引自蔣緯國，〈中日戰爭之戰略評析〉，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4冊，頁10。

³⁶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23。

閱。對於敵情之判斷，甲、乙兩案相同，認為日軍將採取積極之攻勢，速戰速決。進攻方向，為對黃河迤北，由古北口—山海關，經北平—天津，沿平漢、津浦兩路，向鄭州—濟南—徐州前進，殲滅國軍主力，或壓迫、封鎖國軍於西北貧瘠地區。並利用其絕對制海權，由膠州灣—海州等處登陸，威脅國軍黃河北岸作戰軍之側背。在上海方面，預料日軍將以有力部隊登陸進攻，以威脅長江下游中國重要經濟工業中心及首都所在，挫折中國的抵抗意志。³⁷

基於上述對日軍動向之判斷，甲案提出的作戰方針為「在山東半島經海州—長江下游巨杭州灣迤南沿岸，應根本擊滅敵軍登陸之企圖」。而黃河以北地區，「應擊攘敵人於天津—北平—張家口之線，並乘好機越過長城，採積極之行動，而殲滅敵軍」；不得已時，「應逐次占領預定陣地，作強韌之抵抗，隨時轉移攻勢」。在上海方面，作戰計畫亦呈現開戰之初國軍求勝之決心：「應首先用全力占領上海，無論如何，必須撲滅在上海之敵軍，以為全部作戰之核心」，撲滅上海日軍後，國軍直接在岸邊阻擊日軍登陸，不得已時逐次後退，據守既設陣地。³⁸

乙案作戰計畫，採取極為積極之方針，國軍於開戰之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奇襲」日軍所占領各地區，殲滅日軍主力。³⁹ 甲、乙兩案相較，乙案較為簡略，對於發動攻勢後若遭遇不利態勢，未有充分備案。整體說來，中日戰爭中國軍的作戰過程，大抵依甲案而行。⁴⁰

要之，戰前蔣中正對日作戰之戰略為持久戰，以長江為中心，西部省分為後方，尤以四川為最後根據地。開戰之初於上海盡力抵抗，引敵南下，使作戰軸線翻轉，牽制日軍進攻方向由北往南轉為自東向西，創造戰場東西縱深，國軍再節節抵抗，逐步向西後撤，爭取時間，以待國內外形勢之變化。因此，軸線移轉說的確存在。然而，在「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案）」中，雖有於上海開戰

³⁷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政府 1937 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案）〉，《民國檔案》，1987 年第 4 期（1987 年 11 月），頁 40-42。

³⁸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政府 1937 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案）〉，頁 42-43。

³⁹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政府 1937 年度國防作戰計畫（乙案）〉，《民國檔案》，1988 年第 1 期（1988 年 2 月），頁 34-41。

⁴⁰ 對於兩案的進一步分析，參閱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頁 39-44。

殲敵之意圖，卻未顯現改變戰場重心之戰略。因此，該戰略並未成文，是否付諸實行，尚須考察開戰後之狀況。

叁、淞滬會戰的爆發

一、增援華北戰場

若轉移日軍攻擊方向，是蔣中正對日戰爭的重要戰略，那麼，在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理應展開相關部署。實際情形為何？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中正令前方固守勿退，全體動員，以防事態擴大，並下令軍隊向華北增援，欲以積極準備，顯示決心，使日軍不敢輕舉妄動。⁴¹ 初時以調遣地方軍為主，至 12 日，蔣開始考慮「中央軍集中保定」。14 日記道：「北進部隊之行動，應立於進退自如之餘地，如果宋（哲元）完全屈服，則中央部隊決不南調。」17 日記云：「倭寇調關東軍入關威脅冀察脫離中央，以圖其擴張偽組織之野心，余即派中央軍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擊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協定也。」24 日記曰：「中央軍進入河北，倭寇至今始悟其華北獨立之陰謀已為我打破，而其大陸政策亦大遭阻礙矣，故此次派兵入冀戰略之利在其次，對倭政略戰勝之利無人能知者也。」⁴²

事變發生後，蔣雖調遣軍隊北上，仍思以外交途徑解決中日紛爭，未一意求戰。7 月 17 日，蔣針對盧溝橋事變嚴正宣示，如果到了最後關頭，中國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⁴³ 有意藉展現中國之決心來遏制日本之軍事行動。迄至日軍攻陷北平，局勢發生變化。7 月 27 日，北平城外四郊發生戰爭，蔣記道：「倭寇

⁴¹ 參閱國史館《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相關檔案：〈革命文獻—盧溝橋事變〉，《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01-002 至 002-020300-00001-012；《蔣介石日記》，1937 年 7 月 10 日。

⁴²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7 月 12、14、17、24 日。

⁴³ 蔣中正，〈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1937 年 7 月 17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演講，頁 582-585。

既正攻北平，則大戰再不能免」，又曰：「萬一北平被陷則戰與和，以及不戰不和（應戰），與一面交涉一面抗戰之國策，須鄭重考慮。」⁴⁴「對民眾內部之態度，預備應戰與決戰之責任，願由一身負之。」⁴⁴ 28、30 日，平、津相繼失陷。31 日，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表示平、津失陷，已經「忍無可忍，退無可退」，「要全國一致起來與倭寇拚個他死我活！」⁴⁵ 8 月 1 日，蔣主持中央軍校紀念週，表示中國的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勉軍人盡忠報國，效法古之忠烈。2 日，在廬山軍官訓練團演講，指明平、津失陷，為戰爭開始。⁴⁶ 蔣日後亦記感：「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雖欲不戰亦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⁴⁷ 因此，平、津失陷，即所謂之最後關頭，全國當犧牲到底，以求最後勝利。

平、津失陷後，蔣持續將注意力集中於華北戰局，親自指揮作戰，並指示加強工事構築，運用民力等事宜。⁴⁸ 另持續調遣大量兵力增援華北戰場，這些軍隊，包括中央精銳部隊、戰車部隊、砲兵部隊等。⁴⁹

華北戰局緊迫之時，蔣亦注意沿海防禦，認為日軍將在海州附近登陸，乃電負責該地防務的山東省主席韓復榘、青島市長沈鴻烈、第八軍軍長黃杰及第一軍軍長胡宗南等特別警戒，防範襲擊，並電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周至柔派空軍偵查海面。⁵⁰

⁴⁴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7 月 27 日。

⁴⁵ 蔣中正，〈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一）〉（1937 年 7 月 31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頁 217-221。

⁴⁶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 年），頁 19。

⁴⁷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8 月 31 日。

⁴⁸ 相關指示甚夥，參閱《蔣檔》的〈籌筆—抗戰時期（二）〉、〈革命文獻—華北戰役〉各件，典藏號：002-010300-00002-004 至 002-010300-00002-008；002-020300-00008-017 至 002-020300-00008-023。

⁴⁹ 參閱《蔣檔》的〈籌筆—抗戰時期（二）〉、〈革命文獻—華北戰役〉各件，典藏號：002-010300-00002-032 至 002-010300-00002-038、002-010300-00002-060；002-020300-00008-021 至 002-020300-00008-032。

⁵⁰ 參閱《蔣檔》的〈籌筆—抗戰時期（二）〉、〈革命文獻—華北戰役〉各件，典藏號：002-010300-00002-014 至 002-010300-00002-021；002-020300-00008-022、002-020300-00008-024。

因此，至少在 8 月初以前，蔣中正對日戰爭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華北，將大量資源投注於華北戰場，另及海州沿海防禦，及全國防空、動員等事宜，尚未看到其有在淞滬發動全面攻勢、移轉戰爭軸線之舉動。蔣在抗戰前雖曾策劃轉移日軍之作戰方向，但此時應未執行。蓋蔣若此時已確定於上海大打出手，那麼在平、津失陷最後關頭已到之時，按理應及早調動主力集中於淞滬一帶，而非將大批軍事武裝、物資北運華北。⁵¹ 推論出蔣在 8 月初尚未施行戰爭軸線移轉之戰略，當不失實。

二、會戰開戰過程

8 月初以前，蔣中正雖尚無在淞滬擴大戰事之意，卻已開始籌劃淞滬防務。先是，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於上海增加兵力，國軍亦隨之加強防備，中方為顧慮國軍集中不易及維持上海的資源與海口，不願上海輕易發生戰爭。⁵²

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主張在上海主動發動攻擊，認為應該先發制敵、先下手為強，並迭次向南京方面提出主動攻擊之建議，指出若日軍已有軍事行動，應即立於主動地位，發動攻勢。對此，南京方面於 7 月 30 日復電：「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⁵³ 當晚，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南京主持軍事長官會報，商定 8 項，其中包括：對上海日陸戰隊之應付計畫；對漢口日租界之掃蕩計畫；長江上下游各要塞之阻塞及對日艦之掃蕩計畫等。⁵⁴ 因此，此時國軍對上海之日軍，欲採取主動攻擊，但並非為了達到戰爭軸線移轉的全局目標，而是區域性的，為防阻日軍登陸、進攻，而採行先發制敵之積極作為。

此後，蔣中正不斷加強淞滬防備。8 月 6 日，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館奉令將駐

⁵¹ 又如，淞滬會戰開戰之初的前線指揮官張治中在回憶錄中指出，七七事變以後，「原指定協同作戰的空炮兵等，都調到華北去了。」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 年），頁 116。

⁵²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 116-117。

⁵³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 117。

⁵⁴ 「盧溝橋事件第二十次會報」（1937 年 7 月 30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頁 268-270。

漢口海軍及僑民一律撤退，⁵⁵ 蔣為此謂：「倭寇駐漢海軍與租界撤退，此其畏我長江有備，不敢挑戰之表示乎？」⁵⁶ 7日，蔣召開國防黨政聯席會議，地方各重要軍事領袖均與會，午夜始散，會議決議積極備戰並抗戰，惟一面仍令外交部長相機交涉。是日蔣謂：「國防會議開成，全國將領集京赴難，得未曾有之盛況，是為勝利之基也。」⁵⁷ 及至此時，蔣仍未將上海地區視為主戰場。⁵⁸

蔣雖關注淞滬情勢，卻一度以為日軍不會在長江發動攻勢。8月8日記道：「漢口倭軍之果然撤退，其長江各埠海軍亦撤退，是表示其不在長江之意多，而集中以後再行進攻之意少也。」又分析國軍「全部戰略之弱點，乃在山東，應設法補救。」10日，分析日軍動向，記曰：「倭寇戰略，其必先攻察綏後再南下乎？」⁵⁹

淞滬會戰爆發的導火線，是為虹橋機場事件。8月9日下午5時許，日本海軍陸戰隊軍官大山勇夫率兵1名，乘車衝入虹橋機場，為中國航空委員會特務團第八連衛兵阻止，大山即開槍射擊，擊斃中方衛兵，其他衛兵因之還擊，擊斃大山及其隨帶士兵。⁶⁰ 事件發生後，日本以武力威脅中國撤退上海保安隊，並要求中國拆除所有保安隊的防禦工事，日本第三艦隊並駛集黃浦江及長江下游瀏河以下各港口。⁶¹

此時前後，蔣要參謀本部擬辦「掃蕩上海日軍據點計畫」，該計畫由羅澤闈起稿，計劃出敵不意，夜間奇襲，迅速占領虹口等地區各日軍據點及沿江要點，

⁵⁵ 〈漢日軍及僑民 奉令於今日撤退〉，《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8月8日，版3。

⁵⁶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7日。

⁵⁷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7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1937年8月7日，頁84-85。

⁵⁸ 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頁225。

⁵⁹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8、10日。

⁶⁰ 「張治中致蔣中正何應欽等電」（1937年8月9日）、「張治中致蔣中正等電」（1937年8月10日），〈盧溝禦侮（一）〉，《蔣檔》，典藏號依序為：002-090105-00001-193、002-090105-00002-135。此處依中方說法，日方說法與此相異。

⁶¹ 〈上海作戰日記〉（1937年8月11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卷，頁339；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120；〈瀏河口外 日艦圍集 日軍圖偷襲未逞〉，《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8月14日，版3。

阻止日軍登陸增援，目的是先聲奪人，取得初戰勝利。⁶²

8月11日，蔣中正聞知日本艦隊集結在滬，且有8大運輸艦到滬，預料「其必裝載陸軍來滬」，故「決心封鎖吳淞口」。⁶³ 淞滬會戰開戰前，受制於「淞滬停戰協定」，上海市區內僅駐淞滬警備司令楊虎所指揮之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及上海市保衛團等部隊。京滬鐵路沿線有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所指揮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個師，集結於吳縣、常熟、無錫一帶。11日晚間，蔣中正「決心圍攻上海」。晚9時，統帥部電話命令張治中率領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向預定之圍攻線推進，準備圍攻淞滬日軍，並命駐蚌埠之第五十六師、嘉興砲二旅之砲兵一團、在京之砲十團（新十五榴）之一營開赴蘇州，歸張治中指揮。⁶⁴ 12日，蔣復電令第三十六師提前開赴上海，限14日到達目的地，⁶⁵ 增厚上海的攻擊力量。

8月12日清晨，張治中的部隊占領上海，上海居民清早醒來，看見遍地國軍，驚喜交集。⁶⁶ 國軍此舉，實已打破1932年一二八事變以後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1932年5月5日），該協定規定上海附近之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帶，中日在此不駐軍、不設防。並設有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由中、日、英、美、法、義等國駐華外交代表各派文武官吏1人組成，討論日軍的撤退程序及監視日軍撤退、中方接管事宜。由於日軍仍可駐於租界，海軍又可於各處登陸，中、日在上海之軍事實力極不對等。中方乃成立由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保安部隊，以保衛守土。⁶⁷

⁶² 後來的戰事未按該計畫執行。劉勁持，〈淞滬警備司令部見聞〉，收入劉勁持等著，《正面戰場淞滬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頁35。當時劉勁持係淞滬警備司令部參謀。

⁶³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11日。

⁶⁴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12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年再版），頁6。

⁶⁵ 「蔣中正致蔣鼎文電」（1937年8月12日），〈革命文獻—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09-019。

⁶⁶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121。

⁶⁷ 「淞滬停戰協定」，〈外交部與駐外各使領館間函電雜卷（四）〉，《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102-0187；「『一二八停戰後接收上海戰區』卷節略」，〈一二八事變—停戰後接收上海戰區（一）〉，《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113-0018；李君山，

在此之前，國軍在上海的活動，不是化名為保安隊，便是以便衣隊行之，此時公然進駐，引起日方抗議。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在一二八事變雙方撤軍之後已休會 3 年。1937 年 6 月 23 日，日方以中國在吳淞興築砲臺，違反「淞滬停戰協定」，要求再度召集該會，中方聲明一切措施以和平為目的，會議遂以結束。張治中部進駐上海之後，日本總領事岡本季正再度要求開會。8 月 12 日，共同委員會召集緊急全體大會，岡本於會中表示，中國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在限制區域內繼續推進，為作戰準備，不獨妨礙租界安全，且違反停戰協定，請各國代表注意及採取有效制裁方法。中方代表、上海市長俞鴻鈞則反駁，謂日本軍隊每日開滬甚多，且時常侵入八字橋一帶區域，停戰協定早為日方撕毀云。該會最後以雙方聲明不先開釁而散。⁶⁸

蔣中正雖決心圍攻上海，但仍顧慮外交，以為若主動開釁，難以對國際交代，故尚未確定上海開戰日期。8 月 12 日正午，張治中部署就緒後，即電蔣希望於 13 日發動攻擊，並與空軍同時行動。⁶⁹ 蔣傍晚急復電：「希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⁷⁰ 是日蔣自記：「對倭再作一次之討論。」⁷¹

8 月 13 日晨，日軍於橫濱橋、寶山橋附近向中國便衣行人射擊，經中方哨兵還擊數槍而止。同時，日軍 300 餘人開入水電路、持志大學、粵東中學。國軍又於商務印書館附近與日軍衝突。張治中遵奉蔣中正命令，囑咐下屬「應鎮靜避免小部衝突」。是日午後 6 時，日軍「以坦克車及步兵向我軍工路虬江橋攻擊，同時敵艦向市中心之區連續射擊」，國軍仍抱持「敵來攻就還擊，敵不來攻就做工事」。在八字橋附近，雙方衝突擴大，日軍射擊在八字橋做工之國軍，繼用小

《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頁 12-13。

⁶⁸ 「俞鴻鈞致蔣中正電」(1937 年 8 月 12 日)，〈盧溝禦侮(二)〉，《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2-475；〈共同委員會會議記錄〉，《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102-0189；〈上海虹橋事件〉，《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20-010103-0003。

⁶⁹ 「張治中致蔣介石何應欽電」(1937 年 8 月 12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 341。

⁷⁰ 「蔣介石復張治中密電稿」(1937 年 8 月 12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頁 341。

⁷¹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8 月 12 日。

砲射擊，中方乃以迫擊砲還擊。張治中嚴切諭知前線「除非敵軍進攻，不許開槍」。⁷² 8月13日的中日衝突，究竟誰先開第一槍？上述依據中方張治中呈蔣中正之檔案，顯示為日本啟釁，但日方說法相反，直指當日商務印書館的中國軍突然向日本陸戰隊陣地射擊，日方因此回擊；同日黃昏，在八字橋附近的國軍開始砲擊以後，終於進入交戰狀態。⁷³ 時任國軍第八十八師參謀長的張柏亭，日後透露：「易瑾營射出了淞滬抗日戰役的第一槍，時為十三日午後三時稍過」；⁷⁴ 第五二二團團長吳求劍透露，該團（易瑾為下轄營長）於13日下午對日軍開火。保安總團總團長吉章簡則回憶，13日上午9時1刻，日本海軍陸戰隊化妝為浪人，闖入其防區鬧事，該團對空鳴槍，日軍乃還擊，「中日雙方的全面戰爭，就這樣開始了。」⁷⁵

不論中日誰先開第一槍，蔣中正在8月13日並未下達開戰命令，反而顧慮中國承擔開釁之責，欲避免衝突，即「等敵人先動手打我們，我們才能回擊，否則國際輿論對我不利」。⁷⁶ 故張治中見前線衝突不斷時，在呈蔣之文電中，曾不斷提及囑咐下屬避免衝突、不許開槍。13日夜間，軍事委員會始下達命令，於明日拂曉發動攻擊：「令第九集團軍（淞滬警備軍隊改編者）於明十四日拂曉開始攻擊虹口、楊樹浦。」⁷⁷ 令空軍於明（十四）日出動，協同陸軍作戰。」⁷⁸ 令海軍部封鎖江陰江面。」⁷⁷ 14日，國軍對上海楊樹浦及虹口公園一帶之日軍實行圍攻，占領八字橋、持志大學、滬江大學各要點，準備對日軍根據地實施掃蕩。上午9時，豐田紗廠之日軍被迫撤退。⁷⁸ 張治中日後在回憶錄中，亦明確指出國軍進攻到14

⁷² 「張治中致蔣中正何應欽電」（1937年8月13日），〈盧溝禦侮（二）〉，《蔣檔》，典藏號：002-090105-00002-469至002-090105-00002-472；〈上海作戰日記〉（1937年8月23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卷，頁410。

⁷³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年），頁262。

⁷⁴ 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傳記文學》，第41卷第2期（1982年8月），頁18。

⁷⁵ 吳求劍、吉章簡的回憶，為學者黎東方親訪所得，收入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傳記文學》，第41卷第2期（1982年8月），頁18-19。

⁷⁶ 此據張治中轉達蔣中正的指示。劉勁持，〈淞滬警備司令部見聞〉，收入劉勁持等著，《正面戰場淞滬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頁37。

⁷⁷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頁16。

⁷⁸ 「何應欽致陳誠寒申電」（1937年8月14日），〈淞滬戰役戰況副電集（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81-018。

日才開始，「大家都說這一次淞滬抗戰為『八一三』戰役，實際上八月十三日並未開戰，不過是兩軍對壘，步哨上有些接觸，正式的開戰是在八月十四日」。⁷⁹

8月14日上午，中國空軍開始向黃浦江的日艦進行轟炸，張治中於下午3時下達總攻命令，4時中國砲兵開始集中射擊，步兵攻擊前進。然日沒未久，蔣中正急令：「今晚不可進攻，另候後命。」⁸⁰ 蔣為何下令停戰？或與開戰後列強之態度有關。14日中國空軍有2彈落於英法租界，引起列強不滿，⁸¹ 蔣謂：「第二大隊有二機彈鉤被敵擊壞，故有二彈落於英法租界各一顆，因之英、法、美國大不滿意，責難備至，對滬戰有干涉之勢。」⁸²

8月15、16日，張治中奉令作攻擊準備，並未實行全線攻擊，僅攻占若干據點。同時，蔣電令將開到順德一帶之戰車星夜調回上海，戰車防禦砲亦調兩連回滬；又令速運第八十七、八十八兩師迫擊砲等各種砲彈前往接濟。⁸³

明晰淞滬開戰過程，可知中方早有意主動發動攻勢，此一主動，即料定日軍將在上海擴大事端，為達防禦目的而採取之積極作為。蔣中正當時顧慮列強態度，尚未下達攻擊命令，8月13日中日前線的衝突，才促使蔣下令14日發動攻擊。因此，戰役初期，國軍尚屬「倉促應戰，臨時調度」，⁸⁴ 非為移轉戰爭軸線而執行深謀遠慮之全面攻勢。

⁷⁹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122。

⁸⁰ 「蔣中正致楊虎張治中電」（1937年8月14日），〈籌筆—抗戰時期（三）〉，《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03-008；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頁123。

⁸¹ 「俞鴻鈞致何應欽電」（1937年8月14日），〈對美關係（二）〉，《蔣檔》，典藏號：002-090103-00003-115。

⁸²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14日。

⁸³ 「蔣中正致徐永昌等電」、「蔣中正致何應欽電」（1937年8月15日），〈籌筆—抗戰時期（三）〉，《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03-011、012。

⁸⁴ 〈中日戰爭上海戰役回憶錄〉，《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91-001。又如，滬戰擴大後，顧祝同就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以負責實際指揮第九及第十五兩集團軍之責任，亦屬「臨時決定」。參見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頁170。

肆、戰略演進

淞滬會戰開戰之初，國軍在上海的兵力計有第三十六師、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獨立第二十旅、淞滬警備總團等部隊，⁸⁵ 多為中央嫡系部隊，裝備精良。⁸⁶ 然此時國軍之部署，未若一些著作所說，將主力 50 多個師集中在華中發起主動攻勢。像是中央精銳的第十八軍（下轄第十一師、第十四師、第六十七師、第九十八師）本預定向北輸送，參加保定方面之作戰，「旋因滬戰爆發，奉命改向蘇州附近集結」。⁸⁷ 因此，淞滬會戰是逐步擴大，而蔣之戰略亦有一演進過程。

一、掃蕩淞滬日軍

8 月 14 日，蔣中正以前方軍事緊急，急諭陳誠速由牯嶺回京。陳誠到京後，奉蔣命到淞滬前線視察，陳即偕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赴滬，18 日晚返京。後來，熊式輝向蔣報告不能打，陳則報告：「不是能不能打的問題，而是要不要打的問題。」⁸⁸ 蔣要陳加以說明，陳接著說：

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不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以達成二十五年所預定之戰略。⁸⁹

蔣聽聞後，道：「打！打！一定打！」陳趁此機會建議向上海增兵。蔣隨後便發

⁸⁵ 〈中日戰爭上海戰役回憶錄〉，《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91-001。

⁸⁶ 第三十六師宋希濂部、第八十七師王敬久部、第八十八師孫元良部皆為中央軍，裝備較佳，薪餉充足，作戰力強。參見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頁 10、14、24。

⁸⁷ 「第十八軍羅店寶山戰役經過報告」（1937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30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二（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1998 年），頁 206-207。

⁸⁸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頁 52-53。

⁸⁹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頁 53。

表陳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增調部隊，赴滬參戰。⁹⁰由陳誠與蔣之對話，除可證蔣在 8 月 13 日以來尚未決定在上海擴大戰事，並顯示 18 日以後，陳誠與蔣討論了轉移作戰方向之戰略。從蔣反應「一定打」，似可見其是時已接受此一戰略。然由蔣後來的指示與思考觀察，未必如此。8 月 20 日，蔣頒布「戰爭指導方案」、「國軍作戰指導計畫」，設大本營，以達成持久戰為基本主旨，將 10 月下旬為止之作戰稱為第一期作戰，劃分 5 個戰區，「主戰場之正面，在第一戰區，主戰場之側背，在第二戰區」。第二戰區之指導要領提到，「如國軍能始終保有南口、赤城、沽源之線，則平津方面之敵，決不敢冒險南下」，可見軸線移轉說之前提假設——日軍將由平漢線南下，長驅直入武漢，並非當時所懼。此外，「大本營作戰指導計畫」中的敵情判斷，也沒有日軍直驅武漢之猜想。是時淞滬所在之第三戰區指導方針，為「迅將目下侵入淞滬之敵，陸海軍及其空軍路上根據地，掃蕩撲滅，以備敵軍再來時之應付」，「以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並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陸向我取包圍行動之敵，以達成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原則」，⁹¹並無轉變戰場重心之遠大目標。⁹²

⁹⁰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頁 53。

⁹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再版），頁 81；「大本營頒第三戰區作戰指導計畫訓令稿」（1937 年 8 月 20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卷，頁 46-51；「大本營頒國軍戰爭指導方案訓令」（1937 年 8 月 20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二，頁 618。

⁹²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三）》（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再版），頁 251-255。載有軍事委員會於 8 月 20 日頒發之「國軍戰鬥序列及作戰指導方針」，該方針為「以一部集中華北，重疊配備，多線設防，特注意固守平綏路東段要地，最後確保山西、山東，力求爭取時間，牽制消耗日軍。以主力集中華東，迅速掃蕩淞滬海陸軍根據地，阻止後續敵軍之登陸，或乘機殲滅之，並以最小限兵力守備華南沿海各要地」。這段史料，引起學界爭論。或認為這是以訛傳訛的一件史料；或認為此史料在中國（包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雖無原稿或副本，但所述符合國軍當時的戰略，應屬可信。本文以為，這段史料與正文所引之「戰爭指導方案」、「大本營作戰指導計畫」未有太大出入，但多強調「主力集中華東」。從該史料記載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為「蔣中正（兼）」，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當時實由馮玉祥出任，且所載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提到「嗣由李宗仁調任」，可見該史料並非當時的文件照錄，而為後來戰史撰者的編修與概括。因此，所謂「主力集中華東」，應為淞滬會戰演變後的狀況，非 8 月 20 日之國軍戰略。余子道，〈淞滬戰役的戰略企圖和作戰方針論析——兼答馬振犢先生〉，頁 26-44；余子道，〈論中國正面戰場初期的戰略作戰方向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1999 年 2 月），頁 79-

蔣中正仍寄望尋外交途徑解決滬戰，並未一意投入大批兵力吸引日軍於上海。8月20日，蔣自記曰：

本日滬戰頗有進展，南口陣地已固，此心略安。對英提案運用其能實現，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以今日戰況，或有退卻可能也。判斷情報，倭寇陸海軍意見分歧，政府內部不一致，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勢也。⁹³

淞滬會戰開戰後，蔣中正除了軍事上欲澈底消滅上陸日軍，同時欲以此戰擔負政略目標。會戰爆發後幾天，軍政要員蔣中正、汪兆銘、馮玉祥、龍雲等人宴會。席間，汪問蔣：「這次中日戰爭發生在北方，怎麼上海也打起來了？如此豈不成了兩個戰場，我們的兵力夠使用嗎？」蔣答道：「在北方打仗，國際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個國際市場，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國際注意。」⁹⁴蔣在日記中亦呈現相同的意圖。8月26日，記道：「英國駐華大使京滬途中被倭機轟射，受重傷，未知英國取何種態度，但此事必於我無損，而於倭不利，或於全部戰局有關也」；「對俄外交應促其加入戰爭。」31日記曰：「中蘇不侵犯條約簽訂發表，當於現局利多害少也。」⁹⁵

9月2日，陳誠在崑山與蔣中正通電話，報告：「淞滬在戰略上對我極為不利，但在政略上絕不能放棄，亦可不放棄。」⁹⁶蔣聞之贊同。復推知蔣此時擴大滬戰，並非為軸線移轉此一有利之重大戰略，而是為了配合政略之實施。至於所

91；馬振犢，〈平心靜論「八一三」〉，《抗日戰爭研究》，頁101-114。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之更替，參見劉鳳翰，《中國近代軍事史叢書——抗戰（下）》（臺北：黃慶中，2008年），頁14、16。

⁹³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20日。

⁹⁴ 龍雲，〈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文史資料選輯》，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53-54。

⁹⁵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26、31日。8月21日，中國代表王寵惠與蘇聯代表鮑格莫洛夫（Dimitri Bogomolov）於南京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國民政府代表王寵惠與蘇代表鮑格莫洛夫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1937年8月21日），〈革命文獻—對蘇外交：一般交涉〉，《蔣檔》，典藏號：002-020300-00042-002。

⁹⁶ 《陳誠副總統日記》，1937年9月2日，收入《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8CR000071V（以下出處不再註出）。

謂戰略極為不利，所指為何？此或指國軍雖欲掃蕩淞滬日軍，惟此地無險可守，日本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相互支援，火力得充分發揮，並憑藉海、空軍優勢，配合兩棲作戰實施包圍。因之國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⁹⁷ 陷入戰略上極不利之狀況。

二、持久戰略

淞滬開戰之初，蔣有速勝之望。8月14日記曰：「惟望神聖保佑中華，使滬戰能急勝也。」15日，淞滬戰局無進展，蔣認為此非中、日兩軍戰力差距的緣故，而是「人謀之不臧也」。⁹⁸ 這是否表示蔣揚棄持久戰略？當非如此，淞滬速勝，為區域性的；全局抗戰，仍需藉各戰場的持久，以待國際及日本內部之變化。

對於持久抗戰所需之時間，1933年蔣曾表示需要3、5年之久（詳前）；1935年8月21日，蔣構思出「倭寇失敗之程式」：「甲、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乙、對華只能用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其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丙、最後用兵進攻；丁、中國抵抗；戊、受國際干涉進攻；己、倭國內亂革命；庚、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⁹⁹ 此時則料想日本失敗在10年之內。至淞滬開戰當天，8月13日，蔣估計的持久戰時間大幅縮短，認為「倭寇戰爭持久時期約可一年」，並以為「對外戰爭易於內戰」。¹⁰⁰

隨著淞滬戰局進展不利，蔣對淞滬會戰之戰局規劃，漸漸由「急勝」轉為「持久」，與全局的規劃一致。8月28日，蔣記道：「此戰不能避免，惟能持久而已。」9月4日記曰：「滬戰線當可持久，敵雖再增三個師團亦無能為力也。」¹⁰¹ 6日，蔣頒布「第三戰區第二期作戰指導計畫」，已不提掃蕩上海日軍，而強調

⁹⁷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頁679-680；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頁91。

⁹⁸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14、15日。

⁹⁹ 《蔣介石日記》，1935年8月21日。

¹⁰⁰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13日。

¹⁰¹ 《蔣介石日記》，1937年8月28日、9月4日。

「為保持經濟重心，鞏固首都，並有利於全局之持久作戰起見」，對日軍「限制其發展」、「打破其包圍企圖」。¹⁰² 是日記曰：「敵勢滯鈍，我軍源源增加，持久之目的似可實現乎？」¹⁰³ 淞滬會戰後1年，蔣總結道：「我們的戰略，是以持久抗戰，消耗敵人的力量，爭取最後決戰的勝利」。¹⁰⁴ 陳誠是時亦提及淞滬持久之目的：「現在我之方針在持久戰，若能多持久，敵方崩潰即為我之勝利，故國際上現雖因國聯開會關係，但終究視我力量為何，倘我獲最後之勝利，則國際之態度，亦必轉變也。」¹⁰⁵ 足見淞滬持久戰略，有等待中日易勢後決戰之積極設計，亦有支持政略之企圖。

蔣中正對於淞滬會戰的持久戰，一度十分重視當前防線上的持久，本文稱「陣地持久」，而非「以空間換取時間」、「非爭一時一地」的「空間持久」。此一「陣地持久」，蔣實際稱作「持久陣地戰」，其說道：

持久戰最應注意的，是要有與敵作持久陣地戰的心理，我們有了這個信念，自然能固守陣地，自然能儘量運用陣地戰術。……我們只要有一兵一卒，守住一個陣地亦必與之堅持戰鬥，死守不動，沒有命令決不退卻。¹⁰⁶

8月18日，蔣提到「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就要持久戰消耗戰」，「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它的力量」，「我們要固守陣地，堅忍不退。這是我們抗倭勝利唯一要訣」。¹⁰⁷ 8月31日，蔣手令淞滬前線各部隊「雖一兵一卒必與倭寇在原陣地拚死到底，決不容有退後一步之餘地」，並頒布連坐法。¹⁰⁸ 9月11日，草擬通令

¹⁰² 「軍委會大本營訓令及淞滬抗戰第二期作戰指導計畫」（1937年9月6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卷，頁375。

¹⁰³ 《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4、6日。

¹⁰⁴ 蔣中正，〈「八一三」週年紀念告戰地民眾書〉（1938年8月13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書告，頁286。

¹⁰⁵ 「九月十四日」，〈淞滬戰役陣中日記（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4-00001-013。

¹⁰⁶ 蔣中正，〈對左翼軍各將領訓話〉（1937年10月29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演講，頁642。

¹⁰⁷ 蔣中正，〈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1937年8月18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演講，頁608-609。

¹⁰⁸ 9月9日，蔣又再舉連坐法切戒全體將士。請參見「願祝同轉蔣中正手令東申電」（1937

前線各官兵文告，提到「我軍如不自動撤退，則敵軍決不能擊退我軍也」，「必與敵在陣中抗戰到底」。¹⁰⁹ 凡此皆可看到蔣對陣地持久之重視。

陣地持久戰略，與消耗戰略並行，故當時常將持久戰、消耗戰併稱。消耗戰之重點，在藉持久不退，以消耗敵力，「這樣鏖戰愈久，敵人的兵力愈弱，敵人的膽量愈寒，然後我們纔能夠乘機出擊，得到最後勝利」。¹¹⁰ 然則這樣的消耗戰，不僅消耗日軍，國軍必定亦損失甚重，國軍高層如何權衡利害？陳誠曾就此解釋，指出消耗本來是雙方的，差別在消耗程度，認為在同一時間內，必然是我輕而敵重，「因為敵人是工業發達的國家，其彈藥裝具以及其他軍需用品之消耗，必然較我為甚。而且敵方兵員，多係由壯年的生產分子徵集而來，其對於產業界的間接損失，自亦可以想見」。¹¹¹ 由是說來，消耗戰對國軍是有利的。不過，考慮到工業化國家生產力高，日本徵兵、動員能力也較中國為強，消耗戰究竟對中日兩國孰為有利，仍有待探討。¹¹²

及至 9 月 14 日，蔣開始思索「陣地持久」與「空間持久」之得失，記曰：「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抵抗乎？」16 日，蔣電話陳誠，囑轉告：「各部不得輕退一步，歐戰時法軍最後決心不退，終能勝德」，仍持陣地持久戰略，然同時亦萌生空間持久之念頭，是日自記：「上海之得失不關最後之成敗，不必拘泥於此也。」23 日，陳誠建議：「調整第一線部隊，以達持久戰之目的」，蔣表示原則甚妥，囑陳即擬辦法，自己亦開始研究「撤退時機之緩急」。

年 9 月 2 日)，〈淞滬戰役戰況副電集(二)〉，《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82-025；「蔣中正致陳誠轉各軍長師長佳電」(1937 年 9 月 9 日)，〈淞滬戰役戰況副電集(四)〉，《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84-030。

¹⁰⁹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9 月 11 日；《陳誠副總統日記》，1937 年 9 月 3、13 日。蔣草擬的文告發布，見蔣中正，〈告各戰區全軍將士書〉(1937 年 9 月 13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242-243。

¹¹⁰ 蔣中正，〈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二)〉(1937 年 8 月 18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頁 233、235-236。

¹¹¹ 「告本集團軍各官兵同志書」(1937 年 9 月 8 日)，〈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任內滬上作戰〉，國史館藏，《陳誠副總統文物》，典藏號：008-010701-00094-004。

¹¹² 徐永昌的見解便與陳誠不同，其認為「日本係工業國，容易恢復，我則反是，實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險」。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 4 冊，1937 年 7 月 20 日，頁 82。

24日晚間，陳誠至南翔，召集前線各軍事主官開會，詢問各方狀況，表示「現在我之目的為持久戰，若損失太大，則難達持久之目的，故以步步為營之辦法，決定部隊不再向前增加」，於是空間持久戰略付諸實行，上海前線部隊自動後撤，以達逐步抵抗之目的。¹¹³ 然而，這僅是上海前線的陣地稍向後移，國軍並非全面撤至後方國防線，蔣對陣地持久仍有堅持。

三、引敵南下

自開戰以來至9月中旬，為國軍攻勢時期，初始的攻勢，是為先發制敵，其後為了與日軍持久消耗，屢次向前線增援，惟傷亡過大，全線攻勢無形停止，僅餘局部之襲擊。國軍乃由攻勢轉為陣地戰時期，兵力並持續增加，湖南、廣東、廣西各省部隊先後到達。¹¹⁴ 在國軍由攻勢漸轉守勢之時，陳誠向蔣中正呈〈對於本軍方面作戰之意見具申〉，建議國軍趁日軍增援部隊尚未到達，迅速轉取攻勢，內容提到：「現在敵軍可調用之援軍不多，並於華北方面企圖大規模之攻勢，此正千載一時之良機。若華北我再失利，敵兵力能轉用之後，則又陷于各個擊破之不利矣。」¹¹⁵ 這段記載，顯示陳誠並未堅持前述建議蔣中正的誘敵於淞滬之軸線移轉戰略，反而希望趁華北日軍尚未南下，擊滅上海日軍，以免日軍增援後，上海失守，「如是非但影響于全民之熱望、國際之聞聽，抑且斷絕資源，危險孰甚」。¹¹⁶ 陳的建議，未被採納，因蔣已另有考量。

¹¹³ 《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14、16、23、24日；《陳誠副總統日記》，1937年9月16、23日；「九月二十四日」，〈淞滬戰役陣中日記（一）〉，《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4-00001-021。

¹¹⁴ 〈中日戰爭上海戰役回憶錄〉，《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91-001；「對第一部作戰組第一處調製關於第三戰區二十六年作戰經過之所見」，〈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任內滬上作戰〉，《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94-021；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再版），頁65。

¹¹⁵ 「對於本軍方面作戰之意見具申」（1937年9月20日），〈淞滬戰役作戰計劃及意見〉，《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92-001。

¹¹⁶ 「對於本軍方面作戰之意見具申」（1937年9月20日），〈淞滬戰役作戰計劃及意見〉，典藏號：008-010701-00092-001。

在淞滬會戰開戰之初，華北仍為全國的主戰場，其後淞滬前線經過多次增援，至 9 月 26 日前後，蔣已視之為全國主戰場。是日，蔣自記曰：「本日心身較舒泰，對北正面戰事雖不利，但於心無甚慮，係以主戰場在上海也。」27 日，蔣考慮對日戰略，記曰：「(一)引其在南方戰略為主戰場；(二)擊其一點；(三)持久；(四)由晉出擊。」又曰：「下月戰爭方能決定久暫或勝負。」¹¹⁷ 可見到 9 月底，國軍投入淞滬會戰之目的，從先發制敵、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及配合政略，又加上引敵南下。而此引敵南下之戰略，是否意味蔣開始實施軸線移轉戰略？

若要轉移戰爭軸線，可分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為吸引華北日軍至上海，第二為轉變日軍進攻軸線，使其由北向南轉變為由東向西進攻。蔣緯國即認為，要使日本改變作戰線，「第一是壓迫他，第二是誘導他」。¹¹⁸ 「壓迫他」即第一步的吸引日軍至上海增援，「誘導他」即誘使日軍由東向西前進。就此而論，蔣引敵南下，已有第一步之效果，但此時仍看不出蔣有實行第二步之意圖。是時蔣對華北戰局之不利，自記：「本來國防計畫限於隴海路以北一線，故冀察得失不關勝負」，顯示蔣當時並未特別考慮日軍將沿平漢線南下直取武漢，反而認為華北戰線維持於隴海路以北，為國防既定計畫。¹¹⁹ 至於淞滬前線，蔣仍望堅守，亦未見誘導日軍由東向西之作為。那麼，蔣引敵南下之目的為何？

蔣中正於 9 月 29 日的日記中提到，「引敵深入黃河以南，使英、俄著急，不得不參加戰事。」¹²⁰ 因此引敵南下之目的，亦為達成其政略目標。此外，蔣以為「敵之弱點以支戰場為主戰場，故其對華戰爭全在消極，且立於被動地位，故我如處置得策，不難曠日持久，使敵愈進愈窮也」。可見引敵南下亦有使日軍處於被動地位之效果，讓國軍得以「戰略盡其全力，貫注一點，使敵進退維谷，以達我持久抗戰之目的」。同時，在此過程，「使敵之弱點、缺點逐漸暴露，以促進各

¹¹⁷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9 月 26、27 日。

¹¹⁸ 蔣緯國，〈中日戰爭之戰略評析〉，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 4 冊，頁 26。

¹¹⁹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9 月 30 日本月反省錄。

¹²⁰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9 月 28 日。

國之干涉」，並且藉由國民之犧牲與政府（宋美齡）之宣傳，促成國際干涉。¹²¹亦即，引敵南下具有政略、戰略上之多重目的，惟與戰爭軸線移轉並無關連。

會戰後，1938年1月11日，蔣中正於開封的軍事會議上說：「我們此次為什麼要在上海作戰呢？就是要打破敵人的戰略，使他們不能按照預定計劃、集中兵力侵略我們的華北。」¹²²同年5月5日，蔣在日記中記道：

敵軍戰略本以黃河北岸為限，如不能逼其過河，則不能打破其戰略，果爾，則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綽綽有餘，是其先侵華之毒計乃得完成，此於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占華北之戰略，一則逼其軍隊不得不用於江南，二則欲其軍隊分略黃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駐華北。中倭之戰必先打破其侵占華北之政策，而後乃可毀滅其侵略全華之野心。總之，倭寇進入京滬，其外交政策已陷於不可自拔之境，而其進入魯南，則其整個軍略各亦陷於不可收拾之地也。¹²³

11月25日，蔣在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上又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主動地位，而敵人始終處於被動地位」，「在去年平津失陷的時候，我們不能將全國所有的部隊調到華北去與敵人爭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將我們主力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一定先要誘他到長江流域來，……消耗敵人，疲困敵人，誘敵深入於有利我軍決戰的陣地」。¹²⁴以上，皆顯示蔣引敵南下的戰略意圖及構想。不過應特別注意，引敵南下之戰略，並非淞滬開戰之初便有的規劃，而是至9月下旬戰略演進的結果。

¹²¹ 《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30日本月反省錄。楊天石指出：蔣中正引敵南下，有維護中蘇交通線之目的。然其論據為蔣日記9月25日「注意」欄的一句話：「敵擬進占鄭州，以截斷我中俄第二聯絡線。」難以充分證明中蘇交通線與引敵南下戰略間的因果關係，故本文對此說存而不論。參閱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頁232；《蔣介石日記》，1937年9月25日。

¹²² 蔣中正，〈蔣委員長對抗戰檢討與必勝要訣訓詞（上）〉（1938年1月11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年），頁65。

¹²³ 《蔣介石日記》，1938年5月5日。這則日記記於日記本後面的「雜感」。

¹²⁴ 蔣中正，〈蔣委員長對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訓詞〉（1938年11月25日），收入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一），頁128-129。

10月16日下午，蔣中正與徐永昌談戰局。徐以為「祇要上海不失，山西能堅固一半，海州方面不出事（恐敵攻上海不下，急而由海州上陸，威脅我徐州則腹心受敵矣）」。蔣則認為「海州決無事，又一二戰區力不足」，「敵如越黃河南下，斯真不了」。徐以為「敵未必即渡河，特平漢路之兵士氣誠不可恃也」。¹²⁵ 蔣此時憂慮日軍自黃河南下，則其是否展開移轉軸線之戰略？史料上尚無法證實。蔣此時所思，在堅持當前陣地，以待國際、日本局勢變化。其於10月9日記曰：「國際形勢因美國總統聲明有急轉直下之佳象，此為抗戰第一之目的幸已奏效矣。」11日曰：「我國內情穩定，外交有利。」13日記曰：「設法使倭參加九國會議」，「使美國總統主張公道」，「使俄倭戰爭，提早發動」，「使意國不妨礙會議」。14日記曰：「外交形勢漸轉優勝。」15日謂：「相持半年，遲至明年三月，倭國若無內亂，必有外患，須忍之。」¹²⁶ 可見當時蔣十分關注政略進展，此時對抗戰持久的時間估計，若自七七至於次年3月，約為9個月。蔣所以有此較為樂觀之打算，或與其對國際情勢的判斷有關，蓋其對九國公約會議充滿期待，10月23日，考慮對九國公約會議之方針，記曰：「甲、不得妥協；乙、不拒絕調解；丙、不負責於調解不成之責，由敵人負之；丁、目的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及促英美允俄參戰；戊、上海與華北為整個不可分之解決。」¹²⁷ 28日，對前線官兵提及：「我們至少要能支持三四個月，始可轉敗為勝，轉危為安，操最後必勝之權！」¹²⁸ 目前九國公約會議即將召集，倭寇已成為舉世所共棄的國家了！如果我們能再維持三四個月，……國際對我們的同情，愈益深切……國際形勢的轉變，將更不利於敵人！」¹²⁸ 因此，蔣是時對中日戰爭時間的估計，與開戰之初估計之1年相距不遠，非開戰前估計之3、5年或10年，或當時公開演講所稱的「不是一年半載短期可以了結」，¹²⁹ 亦非實際上的8年。

¹²⁵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4冊，頁148-149。

¹²⁶ 《蔣介石日記》，1937年10月11、13、14、15日。蔣此時所以估計明年春天將發生變化，當與美國的動態有關。10月17日，蔣與陳誠談話，陳誠日記便記到：「如何使上海戰事維持至明春（因羅斯福問及此）。」《陳誠副總統日記》，1937年10月17日。

¹²⁷ 《蔣介石日記》，1937年10月23日本週反省錄。

¹²⁸ 蔣中正，〈以光榮的犧牲求最後的勝利〉（1937年10月28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14，演講，頁635。

¹²⁹ 蔣中正，〈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國慶紀念告全國軍民同胞書〉（1937年10月10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30，書告，頁244-245。

四、陣地持久與空間持久之擺盪

國軍在淞滬會戰之損失極其慘重，早在開戰 20 天左右，前線將領張治中和張發奎便主張精密估計上海作戰兵力的最高點，若超過此限度仍無法壓制日軍，則應轉變戰略為「持久消耗戰」（即本文所謂空間持久），先以 10 個師兵力預先占領蘇嘉、吳福線之既設陣地，以為第二抵抗線，該線部隊除非在擴張戰果方面，不得為其他方面使用。然而，此建議因統帥部認為上海應不惜犧牲來確保，及認為日軍已到攻勢頂點，故未獲採納。¹³⁰

其後，統帥部成員白崇禧和劉斐又向蔣建議上海會戰應適可而止，及時向吳福線既設陣地轉移，以保存戰鬥力。至 10 月初，蔣採納此意見，對前線部隊下達向吳福線轉移的命令，惟第二天下午，蔣突然召集緊急會議，表示根據外交部意見，九國公約國家正在開會，只要在上海能繼續支撐下去，九國公約國家可能出面制裁日本。白崇禧、劉斐表示反對，認為命令已經下達，各部隊且已開始行動，在敵人強大壓力下返回陣地，必定引起混亂，結果將不可收拾。蔣堅持己見，當天晚上便與白崇禧同赴前線，說服各部隊堅決死守。¹³¹

蔣中正重視政略，以致在陣地持久與空間持久之間擺盪不已。其以為陣地持久的犧牲，將促成政略的進展，國軍若非以壯烈犧牲，予日本巨大打擊，制止日軍侵犯，則羅斯福的正義演說不會發表，國際聯盟也不會通過譴責日本暴行之議案。¹³² 因此，蔣要求前線「繼續的犧牲、死守陣地、繼續過去的精神，陣地絕不輕易失去」。¹³³ 但戰局進展十分不利，隨著戰況不佳，蔣不得不考慮逐步後退，

¹³⁰ 張發奎，〈八一三淞滬戰役回憶〉，《傳記文學》，第 31 卷第 3 期（1977 年 9 月），頁 60-61。

¹³¹ 唯真（即劉斐），〈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 12 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頁 3-4。第七十八軍軍長宋希濂回憶的時間有所不同，其追憶蔣中正原已批准上海戰場主力部隊，逐步撤退到國防線，並已於 10 月底開始實施；11 月初，蔣卻以九國公約會議即將開會，且上海為重要經濟基地，要求前線繼續堅守 10 天至 2 個星期。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頁 121。

¹³² 蔣中正，〈以光榮的犧牲求最後的勝利〉（1937 年 10 月 28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4，演講，頁 635。

¹³³ 蔣中正，〈對左翼軍各將領訓話〉（1937 年 10 月 29 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

實行空間持久。26 日，蔣考慮「滬戰不利之影響」，因顧慮後撤對政略之影響，乃草擬後撤之對內、對外宣言大綱，該大綱提到：「滬戰未列入整個抗戰計畫之內，一時與局地之得失無關全域之勝敗。」¹³⁴ 同日夜間，淞滬前線國軍移轉陣地，並在閘北留一團死守，以「感動中外」，「以精神打擊敵軍」，¹³⁵ 此即所謂「八百壯士」。「八百壯士」的死守閘北，守備市區堅固建築物及郊區大小村落，寸土必爭，乃為「盡量爭取時間，喚起友邦同情」，¹³⁶ 實亦類陣地持久之所為。

10 月 28 日，蔣中正在松江車站的一節列車中召集軍事會議，出席者有宋子文、白崇禧、陳誠、顧祝同、張發奎等軍政高級長官。諸要員在蔣抵達之前，已先行討論當前局勢，咸認為無法再抵擋日軍的優勢火力。於是在蔣蒞會之後，張發奎提議從淞滬前線轉移 10 個師到蘇嘉、吳福國防要塞工事，以確保有計畫地撤退。會場上，絕大多數同意張的建議。然而，宋美齡此時從上海抵達與會，強調中國若守住上海 10 多天，將贏得國際同情，國際聯盟將幫助抑阻日本侵略。¹³⁷ 同時，九國公約會議之中國代表亦多認為政府應盡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價堅守上海防線，藉以引起西方關注，爭取援助。¹³⁸ 因此，蔣中正決定延遲後撤，繼續實施陣地持久。

1937 年 11 月 5 日，日軍登陸杭州灣，包抄國軍側背，國軍側面陣地陷入大包围圈中，戰況危急。蔣中正在松江會議時，已延後國軍之後撤，此時仍以九國公約國家正在比利時首都開會，為爭取國際聲譽，令再支持 3 日。7 日，蔣考慮「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失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相較，當以前者為重也。」顯示蔣從陣地持久，又擺盪到空間持久。次日（8 日），蔣在內心矛盾之中，下令撤

思想言論總集》，卷 14，演講，頁 643。

¹³⁴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10 月 26 日。

¹³⁵ 《蔣介石日記》，1937 年 10 月 26、27、31 日。

¹³⁶ 此為時為第八十八師參謀長張柏亭會見顧祝同時，顧轉述蔣中正考量所言。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傳記文學》，第 41 卷第 2 期（1982 年 8 月），頁 22。

¹³⁷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記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年），頁 248-253；《蔣介石日記》，1937 年 10 月 28 日。

¹³⁸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678-680。

退，但此時部隊已亂，命令無法下達，全軍潰退。淞滬會戰也隨之結束。¹³⁹

淞滬會戰結束次年，1938年2月2日，蔣中正回顧道：

去年最大之失着，為美總統發表芝嘉谷〔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而於筋疲力盡時，反再增兵堅持，竟使以後一敗塗地，無可收拾。若於此時自動撤退，則敵必至原有駐兵區域嘉崑為止，且可在九國會議上言和也。¹⁴⁰

承認淞滬前線過晚撤退之事實與錯誤，並顯現其為達政略目的，於陣地持久與空間持久產生拉鋸，無法及時實行空間持久戰略。

伍、結論

蔣中正在中日全面開戰前，已策定持久戰略，此一戰略，隨著時間不斷完善。該戰略最遲於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便有考慮，待四川等西部根據地收歸中央，蔣中正獲得供給人力、資源的大後方後，持久戰略遂獲確定，國軍圍繞於此戰略，積極進行整備。最晚在1936年10月，持久戰略衍伸出更為具體的軸線移轉說，規劃在上海發動主動攻勢，以轉變日軍由北往南直取武漢之進攻軸線，而為自東向西之仰攻，國軍藉此獲得節節向西撤退之廣大空間，以撐持持久戰之進行。然而，此戰略僅在高層將領間討論，並未成文為戰爭計畫或命令。

究竟中日雙方誰先發動淞滬會戰？以雙方劍拔弩張之情勢，前線衝突難以斷定孰先開第一槍，但可以確定，在8月13日當天，蔣中正並未下令攻擊，反而要前線力避衝突。戰前，國軍有主動發動淞滬攻勢的準備與打算，其戰略目的為先發制敵，保衛政治、經濟中心，非有移轉戰爭軸線之全局目標；是時戰局之重心，仍為華北戰場。

¹³⁹ 《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7日；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頁58、60。

¹⁴⁰ 《蔣介石日記》，1938年2月2日雜感。

隨著淞滬會戰初期戰事不利，國軍戰略由先發制敵轉為持久戰略，不斷投入大量援軍，戰爭規模也隨之擴大。持久戰略並與政略配合，藉上海戰事引起國際注意，並拖長時間，以待國際局勢轉變及日本內部變化。至 9 月下旬，上海已取代華北，成為國軍的主戰場，淞滬會戰之另一戰略遂以萌現——引敵南下。引敵南下戰略是持久戰略的延伸，目的為造成日軍之被動，使國軍得貫注一點，並藉以牽動外交，支持政略。及至戰爭末期，蔣中正之淞滬戰略受制於政略，在「陣地持久」與「空間持久」間擺盪，會戰中的國軍遂失去有序撤退良機，遭致全軍潰退、一敗塗地之下場。

淞滬會戰末期，蔣中正過於重視政略而牽動戰略，這點早有人提出檢討。陳誠便指出，戰爭既啟，應以戰略為主，不能因政略而掣肘戰略，因為戰略失敗，最初有利之政略，將隨之受到影響。¹⁴¹ 以後見之明觀之，蔣中正對九國公約會議制裁日本或蘇聯等國出手援助，是不切實際的期待，因此，蔣為政略犧牲戰略為其過失之見，似甚合理。然而，戰爭本是政治的延伸，軍事戰略應配合政策而運行，並非戰爭一啟，便置政略於一旁，按戰略自身之邏輯行事。「戰爭不過是政治關係的一種混合其他手段的延續」，為西方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茨的名言，其理論明確指出，戰爭是由政策所宣布，政策為主體，戰爭只是它的工具，因此，政治觀點屈服於軍事觀點，是本末倒置。¹⁴² 蔣策定之抗戰方針，欲藉持久戰以待國際形勢之改變，而是時所預想之戰爭時間約 1 年左右，其以為國際形勢改變在即，故決定於淞滬陣地持久，以待九國公約會議之實質結果。就此而論，淞滬會戰可說是蔣抗戰政略之貫徹；會戰戰敗，非敗在蔣中正以戰略屈從政略，而誤於政略無法施展。

依本文論證，國軍高層在戰前或戰時，雖有移轉戰爭軸線之討論，淞滬開戰初期，卻未實施。其後實施的引敵南下戰略，較接近軸線移轉說。該戰略意圖吸引日軍將主戰場由華北轉至上海，卻仍與軸線移轉說不盡相同。蓋當時並未規劃誘致日軍由東向西進，國軍也未充分準備步步西撤，創造戰場縱深，反而為達政

¹⁴¹ 「對第一部作戰組第一處調製關於第三戰區二十六年作戰經過之所見」，〈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任內滬上作戰〉，《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94-021。

¹⁴²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71-174。

略而「陣地持久」。

綜上可知，蔣中正未實施軸線移轉戰略，而由戰爭全局觀之，淞滬會戰是否達到轉變日軍進攻方向之作用呢？事實上，早有研究指出，民國建立以來，日軍雖有攻占漢口之戰略，但規劃從華東上海開始，沿長江逐次躍進，亦即，溯長江西進，為日軍既定的戰略主攻方向。日軍擁有制海權，沿水路進攻，能充分發揮其軍事優勢，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在華北作戰，便十分仰賴當地河運。並且，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之後，日軍重在速戰速決，企圖與國軍主力決戰，一舉摧毀中國抗戰意志與力量，乃無沿平漢路逕下武漢之戰略。¹⁴³ 因此，淞滬會戰時，蔣中正既未實施軸線移轉戰略，後雖有移轉軸線之態勢，但那是戰事擴大時日軍之既定計畫，淞滬會戰只能說是迫使日軍作戰重心加速南移。¹⁴⁴

那麼，淞滬會戰之戰略得失為何？以初期的戰略來說，在日軍極可能大舉登陸、威脅京滬的形勢下，先發制敵、爭取主動，本是妥善的戰略；然而，國軍部署不當，未能澈底集中兵力，形成重點，加以步砲協同不良等因素，¹⁴⁵ 該戰略未獲成功。引敵南下戰略，有支持政略之考慮，亦有使日軍被動、國軍集中一點以抗敵之目的。該戰略對政略之效果並不顯著，日軍南下後，國軍擊其一點，也無扭轉戰局之功，雖多少牽制華北日軍力量，惟效果有限。¹⁴⁶ 持久戰、消耗戰略，成功打破日軍速戰速決之企圖，使戰爭走向長期化發展。然而，蔣過於重視陣地持久，導致國軍大量傷亡，亦未能獲致政略上的效用，反而因此未能掌握後撤時機，全軍潰退。要之，蔣中正的淞滬會戰戰略，有其得，亦有所失。¹⁴⁷

¹⁴³ 徐勇對日軍攻占武漢之戰略有完整的研究，參閱氏著，〈日本侵華既定戰略進攻方向考察〉，《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3期（1996年8月），頁139-151。該文亦指出，日本並非完全沒有提出沿平漢線南下為主攻方向之建議，這些建議多提出於南京戰役至武漢會戰之間，但南下方案以日本華北占領區治安不良，終未被採用。相似看法，參閱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頁165-172。

¹⁴⁴ 徐勇，《征服之夢——日本侵華戰略》（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29-134、157-164。

¹⁴⁵ 「滬戰經過及教訓」，〈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任內滬上作戰〉，《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94-023；《蔣介石日記》，1937年11月20日本週反省錄。

¹⁴⁶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頁172-177。

¹⁴⁷ 另一說認為淞滬會戰爭取工業內遷。如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指出：「在相持三閱月的時期內，我長江下游的物資與工廠得以內運，國際觀感為之一新，所獲政略上的成就甚

許多關於蔣中正在中日戰爭的戰略論述，常以實際上打 8 年的格局作分析。但若深入蔣中正的脈絡，可以發現蔣固然對持久戰早有規劃，但這個持久的時間可以是 1 年，可以是 3、5 年，也可以是實際上的 8 年。蔣中正所估計持久的時間，是隨戰局與國際局勢而變動的。明瞭這一點，或許就可以跳脫軸線移轉說這種大的論述，實際且深入地去看蔣中正的戰略構想與布局規劃。

大。」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臺北：坤記印刷，1978 年 4 版），頁 221。實當時上海工廠內遷，時間失之太晚，且無全盤計畫，加以遷廠困難，人民心存僥倖的因素，工業內遷的成果，不如人意。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頁 177-187。軍用物資之內遷尤其嚴峻，徐永昌在 11 月 19 日的日記中提到何應欽云：「僅軍政部之要品，須一百列車方能運走。」於是徐於次日向蔣中正提議固守當前陣地（左翼錫澄線，右翼為長安鎮至烏鎮驢村市之線），謂「以論搬運持久抗戰所需之器才〔材〕械彈，亦應先固守此線。」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 4 冊，頁 181。然國軍潰退過速，這些物資想必不及後運。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外交部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 〈一二八事變——停戰後接收上海戰區（一）〉。
 - 〈上海虹橋事件〉。
 - 〈外交部與駐外各使領館間函電雜卷（四）〉。
 - 〈共同委員會會議記錄〉。
-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任內滬上作戰〉。
 - 〈中日戰爭上海戰役回憶錄〉。
 - 〈淞滬戰役作戰計劃及意見〉。
 - 〈淞滬戰役陣中日記（一）〉。
 - 〈淞滬戰役戰況副電集（一）〉。
 - 〈淞滬戰役戰況副電集（二）〉。
 - 〈淞滬戰役戰況副電集（四）〉。
- 《陳誠副總統日記》（臺北，國史館藏）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 〈革命文獻——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
 - 〈革命文獻——華北戰役〉。
 - 〈革命文獻——對蘇外交：一般交涉〉。
 - 〈革命文獻——盧溝橋事變〉。
 - 〈對美關係（二）〉。
 - 〈盧溝禦侮（一）〉。
 - 〈籌筆——抗戰時期（二）〉。
 - 〈籌筆——抗戰時期（三）〉。

二、史料彙編、文集、年譜、報刊

《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8 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政府 1937 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案)〉，《民國檔案》，1987 年第 4 期(1987 年 11 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國民黨政府 1937 年度國防作戰計畫(乙案)〉，《民國檔案》，1988 年第 1 期(1988 年 2 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關於中國抗日戰備之兩份建議書〉，《民國檔案》，1991 年第 2 期(1991 年 5 月)。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2 編·軍事二。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鳳凰出版社，1998 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書信集——與蔣中正先生往來函電》，上冊。臺北：國史館，2007 年。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2 編作戰經過(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13、14，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 30，書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

三、日記、回憶錄、訪談錄

王世杰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 1 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年。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臺北：國史館，2004 年。

宋希濂，《鷹犬將軍——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 年。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 年。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臺北：坤記印刷，1978 年 4 版。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 3、4 冊。臺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唯真（劉斐），〈抗戰初期的南京保衛戰〉，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

張柏亭，〈八一三淞滬會戰回憶〉，《傳記文學》，第41卷第2期（1982年8月）。

張發奎，〈八一三淞滬戰役回憶〉，《傳記文學》，第31卷第3期（1977年9月）。

張發奎口述，夏蓮瑛訪談記錄，鄭義翻譯校註，《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年。

黃德馨，〈京滬杭國防工事的設想、構築和作用〉，收入劉勁持等著，《正面戰場淞滬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蔣中正，《蔣介石日記》。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

劉勁持，〈淞滬警備司令部見聞〉，收入劉勁持等著，《正面戰場淞滬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

龍雲，〈抗戰前後我的幾點回憶〉，《文史資料選輯》，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7輯。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顧祝同，《墨三九十自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四、專書

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 Karl Von）著，鈕先鍾譯，《戰爭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年。

李君山，《為政略殉——論抗戰初期京滬地區作戰》。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2年。

杜派（Dupuy, T. N.）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認識戰爭：戰鬥的歷史與理論》。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3年。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

- 京：朝雲新聞社，1975 年。
- 約米尼(Jomini, Antoine Henri)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臺北：軍事譯粹社，1955 年 3 版。
- 約米尼(Jomini, Antoine Henri)著，鈕先鍾譯，《戰爭藝術：戰略、大戰術、以及政治軍事的綜合原則》。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
- 胡璞玉編纂，《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6 年。
- 徐 勇，《征服之夢——日本侵華戰略》。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 年。
- 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再版。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全戰爭經過概要(三)》。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年再版。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0 年再版。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淞滬會戰(二)》。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年再版。
- 鈕先鍾，《戰略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
- 劉鳳翰，《中國近代軍事史叢書——抗戰(下)》。臺北：黃慶中，2008 年。
- 劉鳳翰，《抗戰期間國軍擴展與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2004 年。
- 蔣緯國，《蔣委員長中正先生抗日全程戰爭指導》。臺北：中華戰略學會，1995 年。
- 蔣緯國，《蔣委員長如何戰勝日本》。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 年。
- 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10 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年。
- Liddel-Hart, B. H. *Strategy*. New York, N.Y., U.S.A.: Meridian, 1991, c1967.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2 年第 3 期(1992 年 8 月)。
- 余子道，〈淞滬戰役的戰略企圖和作戰方針論析——兼答馬振犢先生〉，《抗日戰爭研究》，1995 年第 2 期(1995 年 5 月)。
- 余子道，〈論中國正面戰場初期的戰略作戰方向問題〉，《軍事歷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1999 年 2 月)。

- 吳相湘，〈中國對日總體戰略及若干重要會戰〉，收入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之國民政府（1937年至1945年）》。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2版。
- 李 敖，〈蔣介石與八一三〉，收入氏著，《蔣介石研究三集》。臺北：李敖出版社，1987年3版。
- 姜良芹，〈從淞滬到南京：蔣介石政戰略選擇之失誤及其轉向〉，《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1年第1期（2011年1月）。
- 徐 勇，〈日本侵華既定戰略進攻方向考察〉，《抗日戰爭研究》，1996年第3期（1996年8月）。
- 馬振犢，〈開闢淞滬戰場有無「引敵南下」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2期（1994年5月）。
- 馬振犢，〈平心靜論「八一三」〉，《抗日戰爭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
- 孟彭興，〈蔣介石上海抗戰決策研究〉，《軍事歷史研究》，1994年第1期（1994年2月）。
- 黃道炫，〈淞滬戰役的戰略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1995年5月）。
- 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年。
- 楊天石，〈國民黨人的「持久戰」思想〉，收入氏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二）》。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
- 劉貴福、朱晉平，〈從《蔣介石日記》看淞滬抗戰的一個問題〉，《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1期（2008年1月）。
- 劉維開，〈《蔣中正日記》及其衍生資料〉，收入陳進金主編，《國內蔣中正典藏資料研析》。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3年。
- 蔣緯國，〈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7卷第9期（1975年7月）。
- 蔣緯國，〈抗戰史話：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8卷第6期（1976年4月）。
- 蔣緯國，〈抗戰史話：八年抗戰是怎樣打勝的〉，《中央月刊》，第8卷第11期（1976年9月）。
- 蔣緯國，〈中日戰爭之戰略評析〉，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4冊。臺北：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編輯委員會，1981年。

